

试析柳公权书法思想中的禅学趣味

孙俊红

(青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,青海 西宁 810000)

[摘要]晚唐大书法家柳公权一生致力于书艺,淡泊处世,言行举止透露着深刻的悟禅之道。本文对其书法思想中的禅学趣味进行了阐述分析。

[关键词]柳公权;禅学;书法

[中图分类号]J292.24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12-0014-02

禅宗理论的核心是“见性说”,即众生自性本净,圆满具足;只需“自身、自性、自度”,不需向外驰求。禅宗明确主张“不立文字”,但历史上却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语录、偈颂等禅学文献。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,比如晚唐的禅学是在盛唐、中唐的整体性思想危机发生之后,才慢慢成为一种越来越显要的信仰方式的,它同时也是佛教分宗立派的结果。随着盛唐士人情怀的绽放以及随后的中、晚唐的国势衰败,人们对旧有理论的兴致已经大不如前。从盛唐那里来的自信、豪纵且不加修饰地袒露内心的自我观照方式,越来越成为他们强化内心感悟、凸现个体体验的依据和人生境界。另外,道教地位在盛唐时期的提升,也促使它们把本土宗教中的“反朴”、“虚心”、“修观”、“成心”等观念纳入到感悟的知识语境当中。从晚唐仕人的艺术和人生信仰中,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他们对个体人生哲学的思考。末世的情怀让晚唐的士人们渐渐走入自己的内心。而外在人世的变化和无常却已逐渐远去,更不用谈什么家国的事情了。禅学修行方式的灵活也为这时候的仕人所推崇。它没有了先前佛教的种种戒规和程序的约束,只需有持戒和坐禅的信念即可。由禅学而入书画艺术,肇始于盛唐的张旭、怀素,常以癫狂妙悟的意态呈现,晚唐的书家在这样一种方式的观照下,苦心经营着书道艺术。

柳公权正是在如此情况下在书法史上称名的、独步晚唐的宫廷书法家。柳公权(778~865),字诚悬,京兆华原(今陕西耀县)人。其父柳之温,官至丹州(今陕西宜川)刺史。公权“幼嗜学,十二能为辞赋”。宪宗“元和初,进士及第,释褐秘书省校书郎”(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),走上仕途。历任秘书省校书郎、翰林侍书学士、河东郡公、太子少师等职,卒寿八十八。初学王书,遍阅近

代笔法,体势劲媚,自成一家,有“钟王复生,无以加也”之誉。

书法是表现人的性情的艺术。清刘熙载曰:“书,如也。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。总之曰:如其人而已。”(《艺概》)唐孙过庭曰:“虽学宗一家,而变成多体,莫不随其性欲,便以为姿。质直者则径挺不道,刚艮者则又倔强无润,矜敛者则弊于拘束,脱易者则失于规矩,温柔者伤于软缓,躁勇者过于剽迫,狐疑者溺于滞涩,迟重者终于蹇钝,轻琐者染于俗吏。斯皆独行之士,偏玩所乖。”(《书谱》)尽管现代不少人对“书如其人”颇有异议,但书法与人的性情密不可分却是公认的事实。书法史上,王献之的外拓,张旭的颠,怀素的狂,虞世南的含润,欧阳询的险劲,褚遂良的秀媚,颜真卿的伟岸,都表现了各自的性志才学。同是师法古人,然创出新体的风貌不一,这主要是因为性志才学的不同,其中性志是决定书法风貌的最根本的因素。柳体的形成也是如此,除了其师法古人——法源以外,还有更为深刻的根源——心源。

柳公权生活在晚唐黑暗险恶的宫廷政治旋涡之中,宦官专权,牛、李党争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,这对他的性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从史籍所记载的柳公权的点滴言行中,我们可以略窥其心迹。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记载:“便殿对六学士,上(文宗)语及汉文恭俭,帝举袂曰:‘此澣濯者三矣。’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,唯公权无言。帝留而问之,对曰:‘人主当进贤良,退不肖,纳谏诤,明赏罚。服澣濯之衣,乃小节耳。’时周墀同对,为之股慄,公权辞气不可夺。”这段记载生动地表现了柳公权刚直不阿的性格,这种性格反映在书法上则是峻健刚劲的风格,这种风格贯穿于柳公权书法创作的始终。

在柳公权的思想中,虽然有儒、庄、禅,但起主要作

用的还是庄与禅,尤其是禅。尽管柳公权没有像同时代的白居易、裴休那样成为居士,也见不到他谈禅的只言片语,但他的行为却有十足的禅味:禅宗“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柳公权于书法亦只强调“心正则笔正”;禅宗“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”,柳公权“尤精《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庄子》,每说一义,必诵数纸”,(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),但仅止于“诵”(说讲)而已,不著文字传世。他“十二能为辞赋”,但今所见柳公权诗包括与文宗的联句在内仅有六首,其中三首还是应制而作。文宗朝时,大臣进献诗文著作成为风气,柳公权也无动于衷。他是全然超脱的:超脱于宫廷政治——身居三品、二品高官达27年之久,从不涉足政事,对皇帝的劝谏也仅限于帝德而无涉治国方略。超脱于是非恩怨——敬宗时,王播厚赂宦官求领盐铁转运使,身为起居郎的柳公权曾与朝臣一起上殿,论其奸邪。王播死后,仍为其书写碑文、墓志。宋人以为这是迫于人情,其实这正表现出禅宗“不思善、不思恶”的破执精神。正是这种破执精神,使他与人交往的大门开放,无亲无疏,善恶不计;晚唐宫廷的险恶,又使他在人事交往中紧闭心扉,密不可测,因而他从未卷入人事纷争的旋涡之中。

柳公权甚至超脱于世俗生活的一切:“公权志耽书学,不能治生。为勋戚家碑版,问遗岁时巨万,多为主藏竖海鸥、龙安所窃。别贮杯盂一筥,緘滕如故,其器皆亡。讯海鸥,乃曰:‘不测其亡。’公权晒曰:‘银杯羽化耳。’不复更言。”(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)

正是这种生活中的全然超脱,使柳公权书法形成了四周疏散、中宫紧密、壁垒森严的特色,散发出超仪的禅味。其体态神情恰如宋代独具慧眼的米芾所说:“如深山道士,修养已成,神气清健,无一点尘俗。”

当一个雄强的时代过去的时候,接下来的艺术一般很难再有同样气度的壮观出现,它会自觉地和这个大时代拉开距离。晚唐绮丽文风的兴起,也带动了书坛向道媚风格的转化。柳公权的诗词藻清丽、意蕴较足,

白居易对他的评价是“向此高吟谁得意,偶来闲客独多情”。多情和尚意的诗文倾向,对他的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《金石文考略》卷12即称柳书“道媚劲健”,《佩文斋书画谱》也称其书“盖其法出于颜,而加以道劲丰润,自名一家”。

柳公权一生的言行无不体现禅宗的基本理论及其两个重要特征。一个特征是禅是实践的。这里所谓“实践”,不是指特定含义的社会实践,是指人生的实际践履。禅要在人生实际中领悟,又要贯彻到人生实际中去。禅宗标榜“不立文字”,其重要含义就是强调禅即在实际生活之中,靠每个人自己从实际中去体验。百丈怀海法嗣大慈寰中上堂示法说:“说取一丈,不如行取一尺;说取一尺,不如行取一寸。”这显然是强调“行”的重要性。雪峰义存门下保福从展说:“举得一百个话,不如捡得一个话;捡得一百个话,不如道取一个话;道得一百个话,不如行取一个话。”“话”即“话头”,禅宗丛林中把古德的言句行迹作为参悟的对象,成为“话头”。从展说不论多么熟悉这些话头,也不如自己能身体力行之。另一特征是禅是独创的。自佛法传入中土,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上扎根、发展,就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实现着“中国化”。从实际情况看,自唐初道信弘传所谓“达摩宗”直到北宋黄龙派、杨歧派兴起这四五百年间,禅宗发展变化,新态百出,从观念到方法不断花样翻新。一代代禅匠中的卓越人物,对禅各有独特的解会,各有特殊的悟道机缘,千姿百态、富于个性,这种独创性是禅宗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,又成为创造出丰富多彩的“禅文学”的决定因素之一。柳公权以他精妙的书艺和淡泊闲情的处世方法也“说”出了禅之宗旨,这是更高境界之中的参禅之道。

柳公权是唐代著名书法家,他虽身为高官,但在书法艺术的改革和发展中,做出了突出的贡献,为唐代辉煌灿烂的书法发展进行了总结,也为整个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确立了规矩,树立了模范。

[参考文献]

[1]董诰等.全唐文[M].北京:中华书局1983.

[2]计有功.唐诗纪事[M].北京:中华书局1965.

[3]刘昫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1975.

[4]范文澜.中国通史简编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1965.

[5]姜剑云.禅诗百首[M].北京:中华书局2008.

[6]孙昌武.中国佛教与文化[M].北京:中华书局1988.